

史学纵横

[编者按]悠久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改革遗产。与汉唐相比,宋代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层面,并促使宋代社会出现了种种变化,这既是社会自身日积月累的进步所致,亦是人们(包括其时的统治阶层和平民百姓)为适应社会进步而主动变革的结果。北宋中叶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虽未取得预期效果,但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对宋代改革作出新的审视和反思,本刊与中国宋史学会共同组织了这期专题讨论。当今,中国正在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中奋力开辟着前进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只有不断深化改革进程,中华民族的复兴才会最终实现。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宋代改革的历史特点及后世影响 (专题讨论)

[摘要]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宋代;政治基调;经济变革;兵制改革;科举改革;王安石变法;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44、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7071 (2008) 05 - 0060 - 14 **[收稿日期]** 2008 - 08 - 29

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邓小南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考察宋代的政治变革,或许可以从深刻影响这一时代的“祖宗之法”谈起。“祖宗之法”是宋人口中、笔下经常出现的提法,其实质是指宋太祖、太宗以来逐渐形成的以防微杜渐为核心精神的基本治国原则,以及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诸多做法与说法。

所谓“祖宗之法”,无法逐一历数。就通常被肯定的方面而言,主要有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对于后妃、宗室、外戚、宦官的限制,以及对于士大夫言事者的信用与宽舒,等等;就其负面内容而言,主要有“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总体政策造成的国势不振,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方针带来的效率低下,以及对于喜事兴功的戒惕,等等。其中,有豁然开明之处,也有因循

保守的方面;有理性务实的措施,也有荒唐混淆的做法。而在今人眼中相互矛盾的这些表象,若就宋代政治实践而言,却都建立于“专务以矫失为得”^[1](卷12《法度总论二》)的原则基础之上,共同渗透出宋人意识中的“防弊”精神。“防弊”的针对性堪称具体,但缺乏远见卓识与应变机制。在这一体制长期运转过程中养育出来的习熟政务、舒卷有致的官僚受到倚重,而真正以天下为己任、气魄器局不凡的政治改革家则往往受到疑忌掣肘。

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2](卷128《本朝二·法制》),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

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纡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更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宋代的防弊之政,并非彻底封闭内缩。防弊是以具体制度作为载体实施的。即以防范“壅塞”为例,转对、轮对、召对等面奏方式,增多了君臣间直接沟通的途径;从中央到地方之政绩考察渠道、社情民意搜集途径的拓展,内外信息交流的频繁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开,增加了士大夫的参政议政机会。伴随这些举措而来的,事实上是走向开放。在士大夫们积极参与设计更革之下,设官分职体制中趋向理性化、规范化的主旨较为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政务运作方面,条规严密、易操作可把握的制度程序;人事举选方面,“以程文为去留”的考试录用方式,以“依资序迁”为准绳的常调选任原则;财务审计、鞫讞分司、磨勘复核等各项事务中浸透的制衡精神;文牍档案材料的完备,技术性实施手段的绵密;士大夫们对于行政运作程序及其内容的密切关注,对于各环节人为因素干扰之警惕……凡此种种,体现出官僚政治运行中防范弊端的自觉程度,也成就了制度趋于完善的过程。事实上,宋代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的达成正是政治开放度大为增加的结果。官僚政体取代此前的贵族政体,其优越性即主要体现在士大夫阶层政治参与度的扩大上。这种参与度的扩大,不仅造就了士大夫阶层本身,更重要的是给宋代政治增添了活力,进而给宋代社会增添了进步的动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改革”通常是指那些具有转折意义、牵动意义的重要事件;推动者一般比较自觉,具有明确的对象与目标。而且,毋庸讳言,改革通常是有官方支持作为动力的;即便是来自底层的自发更革,也需要上层的赞许与因势利导才能得以光大。相对而言,基层、个体、局部的创新则可能是频繁多发而被视为自然的。任何朝代中,重大的改革毕竟为数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作为特例出现并且被记载下来。而渐进的调整、创新乃至日常的衍化则可能发生于各个角落,或体现为持续不断的变化。突变的带动与渐变的累积,构成相辅相成的演变内容;惹眼的改革事件,寻常的政治生态,共同塑造了一个时期的面貌格局。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是这样,从社会变迁的情形看也是类似,即便是在学术界热谈的“唐宋变革”阶段中,实际上亦是如此。

朱熹在回答学生提问时,曾经分析过赵宋开国初

期的“大纲”与“节目”问题:

或言“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2](卷127,《本朝一·太祖朝》)

在朱熹看来,兴弊拯坠是综合性的事业,其中关键首先在于“大纲”的更革;而“节目”则要有所因循,逐渐调整——“此方是英雄手段”。这种区分轻重缓急的错落更迭,是宋初统治者们有效稳定局势的重要原因。

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所谓“保守”、“创新”,在宋人心目中并未赋予特别的褒贬意涵。在当时,保守多指保持守护,“保守祖宗基业”、“保守天下”是宋真宗以来影响颇深的政治出发点。而创新则在许多情况下背负着新建事项、开辟兴造之语义,有时会是警惕的对象。但这并不是说,宋代历史上缺乏创新之举,相反,面向实际而不图功利的氛围,酝酿出了层出不穷且影响久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技术。

对于循守前规带来的“因循之弊”,宋代士大夫的批评不绝于耳。像吴奎有关“朝廷之过,常在乎无事之时因循而不为,有事之后颠沛而失错”^[3](卷171,《皇佑三年八月己卯条》)的说法,周必大等人对于“稍革因循之弊”^[4](卷134,《条具弊事》(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的呼吁,都为人所熟知。宋人也时而称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的认为:“新者精神之谓也”^[5](卷1,《蔡疏·都官郎官上殿札子》);有的强调:“天下旧而不复新,则其事业有所断而不复续”^[6](卷8,《进策五道·臣事下》)。勉力通过变法改革来扭转“累世因循末俗之弊”^[7](卷41,《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者,则有北宋中期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到北宋仁宗以来“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时曾说: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问题)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

与胡(瑗)、范(仲淹)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应该说,宋代较之于前朝,不乏政治革新之举,士大夫们在这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心力。适逢“谷变时节”,宋庆历时期的新政与熙宁时期的新法,都是由士大夫主动推进的政治改革运动。范仲淹“先天下

之忱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宋庆历改革过程中,“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鲜明立场,以道自任与坦率无忌的态度,揭开了宋代历史上富于生气的一页。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批评时政、创行新政,是以弘扬祖宗创立的“纪纲”、“成宪”为其旗帜。其中传达的不是因循保守的倾向,而是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以及要求积极有为的迫切愿望。这使我们注意到,对于“祖宗之法”的倡行与维护,不一定出自保守派别的政治主张,在有些情况下,遵行“祖宗之法”,是作为限制时下弊端、整饬政风的理论依据被提出来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在宋代,为什么不仅是主张保守传统的人物强调凡事依照祖宗朝的“既定方针”行事,即便是主张变革更新的士大夫们,也时常以“斟酌祖宗垂宪”为念。

对于“祖宗之法”,两宋朝野人士的态度并不相同,有发掘借鉴者,有借重缘饰者,也有阳奉阴违的。但敢立殿陛之前正面质疑,堂堂正正表明“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8] (卷59,《神宗皇帝·王安石事迹》)的,仅见于王安石一人。宋熙宁年间,“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最直接的目标首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衍化成集中而突出的政争,关键是涉及到了对“祖宗之法”的更革,从而引发一系列深层次反应。

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所针对的社会问题类似,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追求类似,锐意变革的精神类似,未能达致根本目标的结局也算类似。二者亦有明显的不同:改革的纲领不同,入手的方式不同,汲取的思想资源也不同;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二者对于宋代历史的影响以及后世评价的不同——“王安石变法”牵动幅面的深度及广度,非“庆历新政”所能比拟,它像宋代历史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以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后王安石时代”^[9] (P9)。就其评价而言,“庆历新政”尽管失败了,却受到后世几乎一致的称扬;而对于“王安石变法”,则在近代以前,批评之论远远多于赞颂与支持。要理解这背后的原因,恐怕还是离不开对于“祖宗之法”的认识。

改革变法运动对于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的历史走势造成了深远影响。对于这些事件,以往我们的关注点大多在于改革的压力、法度的内容,而不大注意其终极追求、其推展运作的方式,对其主导力量乃至影响利弊,倾向于“打包”认识,切实细致的观察解析尚非充

分。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改革变法运动之所以在宋代历史上激起巨大波澜,正是因为有悖于赵宋长期以来平缓渐进的主调。

宋代历史的推移,伴随着对于“祖宗之法”不断的再发掘、对于“祖宗”形象的再定位与再塑造。许多精英贤达在寻觅向前的出路时,却采取着回头看的途径,他们付出过执著的努力,试图开掘传统中的资源,希望通过“回归”祖宗而达致再振时势的目标。他们中的一些先进者曾不满于“祖宗法”的束缚,也曾求溯到先王、三代这些更加资深的“老祖宗”,努力从历史的更深处,从根本性的经典中探寻应对现实的新意。

对于“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体现着一代代人对其时代责任特有的理解,也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也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祖宗之法”作为整体被视为神圣以后,立国初期注重实际的合理务实取向反而不得发扬,将其当作固定的政治模式而乞灵依赖,形式上是尊崇,事实上则将其置于难以再生之地。

20世纪初,严复在《致熊纯如函》中曾称: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0] (P668)。

就政治气候及具体制度的渊源而言,很难说元、明、清直接承继着宋代,但从近代的“人心政俗”来看,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或是因循,宋代带来的影响大都深深地渗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这一份政治文化遗产,后来者需要认真去面对。

参考文献

- [1]叶适集·水心别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周必大 文忠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袁燮 絜斋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苏辙 栾城应诏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7]王安石 临川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杨仲良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 [9]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10]严复集:第3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5]卷130)朱熹的回答可谓是鞭辟入里。而且,揭示了一个士大夫与君主关系的重大转变。宋神宗在熙宁时期选择王安石主持变法,其与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共治天下”,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反对派司马光等人尚有独立的人格和操守,他们的“得君行道”不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当君臣变法的大方向一致时就可以合作,如果背离了大方向,君臣之间的合作或“共治”就可终止。王安石两次辞去相位,司马光六辞枢密副使,就与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从宋神宗的角度来说,变法之初欲有所为而不知如何为,因而他需要能帮助他有为的士大夫为他择“术”。所以,他们因“富国强兵”的共同理想走到一起,又因为共同理想中的不同旨趣而分道扬镳。特别是在学会了“许多伎俩”后,皇权的独断专行便无须再有他人的牵制,“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宋神宗如此,宋哲宗、宋徽宗亦如此,甚至走得更远。宋哲宗绍圣、元符时期的绍述派和宋徽宗时期的蔡京集团莫不是备左右趋承的一等庸人。王安石变法的最后走向,对于怀抱理想的北宋士大夫们来说是一种失败,他们不仅没有通过变法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而成就了专制主义皇权,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从与皇权“共治天

[李华瑞(1958—),男,四川省绵竹市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下”的参与者而沦为皇权的附庸。

王安石变法表现在思想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因为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免役、保甲、科举、青苗等新法,在形式和内容有所变化及增损的情况下,均为宋朝以后的历代所延行,说明王安石变法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但是对宋朝以后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没有产生质变的影响,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从思想精神层面来观察,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首次运用儒家政治理念重建社会秩序的一次有益尝试,他们为实践“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力图建立一个较为平等社会的努力,在变法中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参考文献]

- [1]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朱熹 三朝名臣言行录[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3]马永卿 元城语录[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司马光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M] 四部丛刊本
- [5]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form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Aftertime (topic for special discussion)

DEGN Xiao - nan, GE Jin - fang, ZHANG Qi - fan, HE Zhong - li, LI Hua - nui

Abstract: Deng Xiao - nan thinks that “law made by ancestors” is a double - edged sword. More depende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Song dynasty follows the old ways and does nothing at a key moment. Ge Jin - fang thinks that the Song dynasty is based on agriculture, but other factors of commerce such as city, currency, commodity, foreign trade, employer and so on have appeared. Zhang Qi - fan thinks that the military system is vocational. The army is in the hands of the emperor. The leadership of the army is diverse. In the allocation of soldiers, “trunk is strong and branch is weak” and “inner and outer parts are united”. He Zhong - li thinks that the re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politics and the centralized powers, and in addition a strong push to the society,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though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Song dynasty. Li Rui - hua thinks that Wang An - shi's political reform has the sprou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deas of modern society, whos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s far more tha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political tone; economic reform; military reform; the re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ng An - shi's political reform; revelation

[责任编辑、校对:王维国、把增强]